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 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裴长洪¹ 李程骅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北京 100836)

(2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 南京 210018)

摘要: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后危机”阶段,我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的迟滞发展,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来实现转型发展。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应着力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并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重和加快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

关键词: 后危机;城市经济;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1-0015-07

一、后危机阶段:我国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金融危机无论对虚拟经济、还是对实体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经济在危机后也面临重大调整,“后危机阶段”的世界经济形势,不仅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问题,还有低碳经济、新能源经济等主导下的国家、城市之间的新一轮利益大博弈。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推行清洁能源等存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阻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将因受到侵害而强烈反对后,就会从减碳排放、“碳交易”入手来先从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谈判”,美国和欧盟的主导世界发展话语权的思维已经化成了具体的行动,就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新的严峻的现实。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遇到的新挑战,即在受到碳排放约束的条件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以从根本上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并推进城市从“制造型”向“服务型”、从“高碳城市”向“低碳城市”的整体转型发展。

其实,即使没有世界金融危机,即使没有全球性减碳排放的约束,改革开放30年的城市化进程也逼迫中国的城市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了。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如果仍延续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收益、高污染低环保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我国的能源条件、世界的能源供给无法支持,由此带来的排放和污染将引发诸多生态灾难。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内城市来说,既要保持高位的经济增长,又要调整产业结构,而创新型经济的培育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确实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化危为机,转型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央政府保增长、保发展的得力措施,使金融危机造成的恐慌很快过去,经济形势迅速企稳向好,2009年

不仅顺利实现了“保八”的目标,而且为“十二五”定下的“调结构、促转型”的调子,为漫长“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内城市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再者,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有很多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的趋势,而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都得到大大提升,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这给中国的城市在全球生产的网络或价值链上站在高端位置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生产空间就已经通过跨国公司向多国延伸。现在,全球生产网络已经形成,全球生产环节和劳动分工的层次和水平日益深化。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上,由于受到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发达国家的控制等多方面原因,国内的城市一直在低端的生产环节徘徊,无法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的环节延伸。在后危机阶段,国内的城市完全可以必须利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迟滞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的控制能力,迅速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因此,国内城市,尤其是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美元的沿海发达城市,无论从自身的发展阶段还是从外部的条件来看,在未来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将是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二、充分把握城市经济转型、服务业升级的大趋势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发展相比,行政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以“摊大饼”的方式来不断扩展空间规模的,这样必然造成城乡结合部长,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混杂,服务业与制造业混杂,尤其是大城市的服务业集聚度不够高,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也很低。^①国内的城市,在经历了粗放型的发展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共识。在迎来漫长的“后危机”阶段,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充分把握城市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

键节点,大力推进集约发展、“精明增长”,提高“经济容积率”,提升GDP的绿色、低碳含量,就必然成为国内城市的战略性行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和空间载体在城市,城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经济数量与质量的变化,因此“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城市,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处于最前沿的位置。当前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问题,即在都市区实现服务业的集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问题。

第一,土地资本化提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原动力。实现服务业的集聚,就是看一座城市在扣除了环境和生态的需要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土地资源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通过城市土地进入一级市场、土地资本化、住房制度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促使工业向工业园区转移,使城市动员市区土地资源的空间成为可能。这使得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态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促进了服务业在城区的集聚。

第二,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形成,非常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由此形成了城市中央商务区(CBD)。现代中央商务区,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

第三,“经济容积率”规律在发挥作用。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

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这里讲的“经济容积率”,是指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都市中心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出现了税收“亿元楼”,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

第四,经济虚拟化的趋势,生产投入要求资本与知识要素密集,产出只以价值量来衡量。在都市中心区的生产投入中,货币资本投入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体现为科技手段和知识要素的设备、人力资本也同样重要。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是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没有实体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

第五,消费的转型与升级,向生产型消费和区外消费转化。2009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只有34%是居民消费,其他消费都是企业消费、集团消费。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企业、集团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

第六,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

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总起来看,城市的发展是有周期律的,城市经济的理想的转型升级路径,基本上是与人类的工业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一致的,并从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把握这种大趋势,尤其是把握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节点,则需要战略眼光和行动落实的魄力。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利用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期进行城市转型发展,不仅可以降低城市转型的成本,缩短城市转型的周期,而且可以促使城市经济的转型更加顺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城市经济的转型,既有芝加哥、鲁尔等成功的典型,也有底特律失败的教训。国内的城市如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全球现代服务业向中国大城市转移的新机遇,理应超前进行产业空间优化,尤其是树立制造业的服务化、大力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以探索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三、城市经济转型方向: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结构升级

城市是创新的中心和策源地,建设创新型城市是现代城市的共同目标。在现代城市,城市化水平或竞争力的差别,已不完全是城市人口的比重,而是主要表现在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的差别,城市的基本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聚和集成创新要素,二是提供创新的软实力。^②城市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重新配置创新资源和确定新型运行规则的过程,因此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主导下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其中强化以知识、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没有创新性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有创新型城市。创新型经济是注重培育本国企业和R&D机

构的创新能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品,以自主创新为目标和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可见,创新型经济大多是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阶段,具有较强科技综合实力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其重要特征是形成一个国家、城市和企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创新品牌,否则就无法站上微笑曲线的高端位置。因此,从培育创新型经济体系,以及加快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城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大方向:

第一,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发展服务业不能离开先进制造业,不能用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取代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的。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那些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由传统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和经营模式更新而形成的现代服务部门。实际上,我们现在肩负的是双重任务:既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又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是大经济体,不可能象某些小经济体那样依托某些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服务行业来支撑国民经济;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是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建立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因此工业发展是所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其次,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从所有制改革到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的市场准入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和领先于服务产品的改革和开放,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经济必然领先以及必须在工业现代化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即定格局,形成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必然趋势。再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既需要以价值量衡量的增加值和收入的持续增长,也需要以实物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这些都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的继续完成。发展先进制造业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

第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重。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突破口。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其范围主要包括仓储、物流、中介、广告和市场研究、信息咨询、法律、会展、税务、审计、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劳动力培训、工程和产品维修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研发服务业、金融与租赁服务业等。我国服务业发展不仅存在总体滞后问题,结构也不合理,过于依赖生活性服务业的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已经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此,我们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做法。在国际分工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只占全部循环过程5%不到,流通领域占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40%,60%以上发生在服务领域。流通领域缺乏效率,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外包模式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流行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出现了调整,其主旨就是把原先由内部提供的生产和服务环节转移到外部,重组企业的生产体系,通过合约来购买外部优质的资源,包括原先由内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这种外部化的经营战略调整,不仅促进了新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发育成长,而且还使一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出现了服务型的制造企业,众多的跨国企业开始了从制造商到服务供应商的彻底转型。这是一种供应链管理的办法,即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来连接市场体系。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跨国公司的已经进行了发展战略的大调整,一方面不断剥离自己的非核心、次要和辅助业务,不断外包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和巩固以自己为核心或为龙头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供应链体系内部市场,对该体系市场实施供应链管理。供应链核心竞争力来自生产性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格局。现在的市场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市

市场竞争已从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供应链体系之间的竞争; 竞争优势往往不取决于个别企业的特定优势和效率, 而取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跨国企业的影响力也往往不取决于核心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股权控制状况, 而取决于核心企业所管理的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交易规模和辐射范围。凡是从事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等硬件产品的制造商, 其销售必然伴随服务化, 这类企业一般都是先进制造业, 其成长的方向也必然是服务型制造的趋势。

第三, 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这是后危机时代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首先是加工贸易的产品内销, 要突破许多的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海关监管方式和征税制度都要进行改革, 即便进行了这样的改革, 这些产品要顺利进入内销市场, 也有许多的渠道建设, 流通制度、流通组织方式的改革跟进。其次国内商贸流通还缺乏条件, 目前做内外贸一体化, 是家乐福、沃尔玛这些跨国商贸集团, 我们的国内商贸集团做内贸就不做外贸, 做外贸的只做外贸, 怎么样把它连起来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内大量的供应商很分散, 随着生产的不断扩散, 国内通过生产性的服务把他们连接起来, 在国内形成供应链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 因此在国内流通领域通过各种服务供应商把各种的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 整个供应链体系整合起来是我们未来要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条件。还有重要的一条, 由于我们对海外市场非常不了解, 也就不可能把国内生产、流通和海外市场需求联系起来, 只有把对外贸易从过去“引进来”为主, 变成“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特别是在“引进来”的项目中, 要从以制造业为主调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 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⑤只有国内大量的商贸企业走出去了, 比如我们的商品市场、商贸企业走出去, 类似于日本这样的综合商社走出去, 建立海外广泛的营销渠道, 才能培育出内外流通领域的城市供应链体系。

总的来看, 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的过程, 是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过程, 只有奋力站在面向全球的价值链节点上, 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主导的产业链, 并整合与之配套的供应链, 才能实现城市经济的真正转型升级。

四、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 大的危机往往孕育着大的科技创新, 而重大科技创新也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1857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后问世的科学发现成为日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则造就了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 也造就了世界经济新一轮的繁荣。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发展的重心转向“新能源”、“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这将有力推动世界产业走向一条新的创新之路。国内的城市, 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起点上, 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最重要的突破, 是要变原来的投资拉动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构建起政、产、学、研、金等“五位一体”的城市创新体系, 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机互动和高效运行, 强化创新过程的系统性整合与协同, 促使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等相互作用, 形成创新合力。从目前来看, 通过服务业结构升级来引领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 以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提高城市的“经济容积率”。

国内的城市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城市相比, 城市化水平很不够, 如市政基础设施等还需要大投资, 城市交通需要大力加强, 航空、地铁等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城市, 就需要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因此, 国内城市的改造和功能提升, 在追求更高的“经济容积率”的同时, 更应逐渐扩大城市规模, 发展相关服务产业。城市规划是人们按照城市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要求对城市自然环境和生态空间进行布局设计和功能配套划分的综合思维结果。但是, 一定时期制定的规划往往反映当时

人们的认识水平,因此,具有历史局限性,修编规划是正常的。修编规划要处理的主要是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处理好商业地产与居民住宅的关系。应正确认识和反映都市中心区人口居住率下降的规律性与经济产出空间增长的规律性,这是大都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地产形态上看,是住宅形态的用地空间减少,商业地产形态的用地空间增加。一方面要有经济产出,要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还要宜居,这往往是修编规划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是,空间经济产出的集约化趋势对行业的选择和对生产、消费方式的选择。规划要尽可能反映出单位空间产出的最大化要求对行业的选择,因此必然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那些行业或企业成为新规划落地的对象,其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特点也应在规划中得到反映。接着还要考虑的问题是要素密集化的要求,承载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物品和劳动力对生产、消费的需求要在规划中反映。

在做好城市产业空间的优化布局的同时,还要注意衔接好中心区规划与产业空间的衔接与联系。如果我们把都市中心区形容为服务经济的“工厂区”,那么它与整个城市地域的规划关系就是生产区与生活区以及其他功能区域的关系,二者之间需要紧密地衔接。特别是城市的交通与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心区规划有重大影响,也对各种功能区域的规划有重大影响,区域规划的修编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处理土地集约与资本投入的关系上,都市中心区应该是资本要素密集的区域,其土地利用要求愈集约,资本替代要求就愈高。因为资本替代要求实际成为中心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决定因素,城市的中心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就必然意味着资本投入强度的提高。因此,必须积极培育基于空间价值集约的增长动能,调整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使城市在同样的增长情况下,减少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成本。同时要规划与确定合理的功能分区,促进功能性集群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整合城市的开发园区资源,提高园区的集约化程度。积极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过使用混合能源、节能材料和替代性能源产品,减少对石油、煤炭等的使用量,间接的

碳排放。

第二,通过培育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企业来优化城市服务业的结构。

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仅是商务部门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制造部门的事情。即一部分制造业通过专业分工和外包、再通过供应链整合生产组织体系,构建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又一个重要途径。组织供应链通常是核心企业,它依靠优势资源成为核心企业,这种优势资源不一定是资本或技术,它可以是品牌、甚至可以是最终用户的认可和信任。我国的城市必须将调整结构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把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起来,发展其中相结合的产业。一方面可以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通过产品的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特征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使一部分先进制造企业成长为服务型制造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企业组织结构,发展外包业务、扩大分工和服务交换的机遇,促进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组织的成长。这里存在着做大做强和做专做强的选择,做专做强不比做大做强差,做专做强可以实行供应链管理,可以将内部市场做的很大,但自己不一定拥有很多的实物资产。

第三,以集约的理念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推动城市的商业空间网络与社区服务的有机融合。

城市商业空间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网状空间,由不同等级的商业设施构成的点,连接起来才形成了功能多元的商业服务体系,这种服务体系实际上是城市功能的直接显现。当前国内的城市,正在迎来一个结构升级的消费社会,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都将实现大的飞跃,城市提供的商业空间、经营的商业业态,必须超前考虑自身的“定位”。尤其是伴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社区化,社区商业的功能,在城市商业空间、整体空间的变革、优化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社区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新课题,从居民委员会向社区组织的转变,是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基层和草根性变化,对它的研究和关注都不够,为了社区服务的便利性和效率提高,社区服务空间完全可以

和不同等级的城市商业空间进行有机的对接和融合。从现代商业业态的“适应性”来看,按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的消费半径来测算,基本可以分为“邻里消费圈”、“社区消费圈”以及“城市区域型”三种,与其对应的商业设施分别是便利店、社区超市以及大卖场或 MALL。属于社区商业范畴的“邻里消费圈”和“社区消费圈”,将是中国城市商业发展的重点,因为只有社区商业繁荣了,城市的功能才真正体现出来。“社区消费圈”的范围完全可以设定为社区服务业的范围,社区的商圈中心周围则可同步规划建设社区的政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发挥对城市社区肌理的优化、修补功能。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国内城市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机遇到来并不等于城市自身可以自动实现突破和跨越的。在全球城市体系重新洗牌的后危机时期,我国的城市,需要抓住机遇奋力争先,寻求新的发展动力,节约城市转型的成本和代价,发展创新型经济、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化目前国内城市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转型发展,而转型发展的动力则来自创新型经济。我们期待以创新型经济

的发展来促进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促使一批国内城市在“十二五”期间实现真正的转型,并成为国际上从制造性向服务性、从高碳向低碳城市的转型的示范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标杆。

注:

- ①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修订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1 页。
- ②洪银兴:《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后危机阶段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
- ③参见裴长洪《后危机时代: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 年 11 月 29 日。

参考文献:

- [1]裴长洪:《如何认识城市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 年第 8 期。
- [2]屠启宇:《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态势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
- [3]李程骅:《新业态与都市圈消费的“中心地化”》,《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7 期。
- [4]李程骅:《优化之道——城市新产业空间战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责任编辑:秋枫〕

On China Urba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Pei Changhong & Li Chenghu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kes big changes for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the relative long stage of post-crisis, Chinese cit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ontrol for global market by using sluggish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will be embe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order to realiz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To upgrade the 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ic transition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city plot ratio”, promot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coordination,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upgrade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accelerating establishment and integration of foreign urban commerce circulating industry system.

Key words: post-crisis; urban economy;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transition upgrading